

“文艺沙皇”的矛盾和徘徊 回忆我的父亲周扬

对周艾若来说,与父亲周扬的隔膜,在他7岁那年的分离便注定了,这种隔膜一直持续到父亲离世。也许正因如此,看待父亲,周艾若多了一份冷静和审视。



1981年的周扬(左一)

儿时记忆

母亲吴淑媛出身于湖南益阳一大户人家,她的家世比父亲好得多。父亲与母亲算是青梅竹马。我们一家在上海生活时,父亲没有什么固定收入,所以每年回湖南,外婆每次都给母亲带回来一大包金首饰。母亲放在抽屉里,也不锁,每次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。父亲晚年也曾对我说:那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亲——其实是我的外婆。

1934年,母亲又怀孕了,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,这次也不例外。父亲把母亲、弟弟和我一起送回老家,还没等三弟出生,就急着要走,说是工作,而母亲并没有注

意到他的反常。母亲顺利生下了三弟,按交代取名“约瑟”。

1941年的一天,母亲终于有了失去多年音讯的父亲的消息,但是这个消息却让苦苦等待的她一下子堕入深渊——那是《救亡日报》上登载的父亲给郭沫若的一封信,父亲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,末尾附了这样一句:“苏(注:指苏灵扬,周扬的第二任妻子)已进抗大,小孩(注:指周密)已进幼儿园。”

母亲一下子崩溃了,在一个连绵秋雨的寒夜,悄然而逝,走时才35岁……那一年,我15岁,二弟11岁,三弟7岁。

“文艺沙皇”

新中国成立后,父亲曾先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、中宣部副部长。每隔几年,他都会就文艺理论作一次报告,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,其实就代表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,因此,从报纸、文化单位到学校,都必须认真地学习他的讲话,父亲的名气和影响也越来越大。有一次,他在讲话里表扬一系列成功的作品,我问他:“你看过没有?”他老老实实地说:“我哪看得过来?”记得我有一次还问他是否看过哈代,他也说没看过。我问他:“那你为什么要提这些作品?”他说:“让大家研究嘛!”

获得文艺理论的话语权之后,父亲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文艺领域的斗争。建国以后,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,几乎每次运动都是从文艺界开始的,这似乎成了一条规律,文艺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,而父亲在这条路上也越走越远,并由此获得了“文艺沙皇”之称。

其实很多运动之初,父亲的内心也充满

了矛盾挣扎,包括对胡风的处理,他起初也并不认为要上升到敌我斗争的那个高度、打击那么一大片文艺界的人士。当他刚看《武训传》时,他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,还说:“我看很好嘛!我看的时候还掉了眼泪。”当毛泽东决意批判《武训传》后,他又深觉得自己对政治不够敏感,在各种场合、大会小会不断作自我批判,检讨自己,又拼命想“弥补”自己的不足,并且在最后写了一篇批判《武训传》的重头文章,他似乎在想表示自己跟毛主席、为重塑“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”的形象而努力。

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后,父亲总是试图用一些举动,缓和文艺界的肃杀之气。上世纪60年代初,报纸上没人敢写稿,文艺创作也陷于匮乏,父亲主张把杨沫的《青春之歌》、赵树理的《锻炼锻炼》、老舍的《茶馆》等几个作品拿出来讨论,都产生了广泛影响。既要贯彻上面的意图,又要极力团结一些人,被视为“文艺沙皇”的父亲其实也是心力交瘁。

身陷囹圄

1966年7月1日,《红旗》重新发表了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,在编者按语中,公开点了周扬的名字,一夜之间,父亲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、祖师爷,他所在的中宣部则成了“阎王殿”。

父亲对他的被捕毫无思想准备。此后,父亲又陷于很长时间的生死不明的状态,甚至几次传出周扬已死的消息,连他的户口都注销了。一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,有人通知我们家属去秦城监狱里接他,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。

我后来才知道,毛泽东在那一年有

个批示:“周扬一案,似可从宽处理,分配工作,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。久关不是办法。”7月份,他们重获自由。父亲没有马上回家,他说:“我还要写一封信给毛主席,我做自我批评,现在还没有写完。”他写完给毛泽东的思想汇报,还在信里问主席、江青好,几天后才回的家。

父亲在秦城监狱被关了9年,平时没有人可以交谈,所以刚从秦城出来时,几乎失去了表达能力,语言不连贯,声音沙哑,见到人就不停流泪。

我们和继母

1948年秋,我和两个弟弟费尽周折,终于在北平和父亲再见。这是已经13岁的三弟约瑟第一次见到父亲。父亲对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已不大记得,但其中的一句是无法忘却的:“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!”此后,父亲再很少跟我提及母亲,仿佛一直在回避。

我们跟苏灵扬见第一面,父亲指着她说:“这是苏灵扬,你们可以喊她妈妈,也可以喊她同志。”但我什么也没喊,一辈子也没喊,我喊不出来。

因为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,所以在苏灵扬眼里,我是“叛徒”,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认可。我爱人的父亲曾经留学日本,是敌伪时候的警官,虽然早就关在监狱里死了,但是这种出身在苏灵扬那里是不被容忍的。父亲对这件事并不干涉。我后来不顾苏灵扬的反对还是和她结了婚。那年暑假,我们双双来北京看父亲,开门的是苏灵扬,她一看到就说:“你已经背叛这个家庭了,你还有什么资格跑到这里来!”我爱人自尊心大受伤害,扭头便走,从此再也不回这个家。我在哈尔滨工作,每次到北京来看父亲,苏灵扬都坚决拒绝让我住进家里,我只好向同学家借住。

我与周迈、周岳三兄弟,没有在父亲的那个“家”住过一天,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也没有参与过。到北京时,三弟周岳

年纪太小,他愿意和父亲一起生活。当时父亲、茅盾等人每个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独立的小楼,家里很多个房间,但三弟只能住在布满水管子的地下室里,潮湿不堪,但父亲从来也不过问。

我们与苏灵扬的关系在“文革”期间也曾有过缓和。那时候父亲被带走了好几年,生死不明。我去看她,她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,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。那时候她显得很亲和,拿出一个杯子来说:“这是你爸爸用过的杯子,你拿回去做纪念吧。”还有几张小照片,让我拿回去。我心里大有感触:文化大革命那么糟糕,但还能使我们这个家庭走向和谐。

但是当父亲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时,我们的关系又再度紧张。有一次,我和周迈骑自行车去看父亲。那天父亲坐在椅子上,旁边放着一盘葡萄。我们和父亲聊天,中间说句什么话,苏灵扬又开始指责我,我就有准备地回敬她:“我来看看父亲,当然要交流,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思想,你不要什么都打断我们,都说你对,这样不好。”她显然没有准备,被我噤住了。她先是冲父亲发火,然后指着我说:“就是你最坏!”然后转身离开了。

父亲自始至终一言未发,只是长长叹了一口气。我一下子知道了很多东西,父亲有父亲的无奈。

异化风波

1983年,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时,父亲发表了《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》,提出了“异化”理论。但他没有料到,在新的历史时期,一个学术问题,竟然又会演变成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,甚至很快上升到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,继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“清除精神污染运动”。

父亲又一次被卷入政治风浪,陷入矛盾和痛苦挣扎中。他曾经不无苦涩地说:我这辈子前后被打倒过三次,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、信任和亲近的人,相信了卑鄙小人的谗言,要打倒我。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了。

1984年,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,父亲因病未能出席,他只能从医院打来电话表示祝贺,虽然只是一句普通的祝贺,但会场却突然爆发出长达两分钟的热烈的掌

声。1985年1月,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作家们给他写了一封信,一共356人在上面签了名,其中包括不少在反右、反胡风等运动中挨过整的老同志。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父亲的敬意。

不过,父亲在这一次政治风浪中所承受的压力和误解,远远超于“文革”时期。他身体每况愈下,反应也渐渐迟钝,很快他就成了植物人,夜里,会有蟑螂爬上他的脸,而他也毫无知觉。他身体不好之后,却对我们之间的亲情是一种弥补。我们看护他时,他不断回忆起妈妈的好,说对不起妈妈。不过于我而言,我还尚未来得及感受一位父亲的回归。

1989年7月31日,我正在胶东出差,接到电报说父亲去世了。

摘自《活在别人的历史里》
文汇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